

彭卫 著

另一个世界

——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



陕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奇异的心灵世界——

古代的变态行为。这个世界不是微不足道的，

它溅涌的是躁狂的浪花、抑郁的水珠，

散射出怪诞的色彩，奔腾着一条条改道的历史河流。

王朝盛衰、改革运动、民众反抗……留下它冲刷的痕迹；

一些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

科学家和诗人的生活也与之息息相通。

这是一个既有可怕破坏又有不朽建树的世界。

另一个世界

彭卫 著

——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电力大 00124691

(陕) 新登字004号

中国社会史文库
另一个世界
——中国历史上变态行为的考察
彭卫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印钞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6.5印张 1插页 143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419-3524-7 (I·3041)

定 价: 5.40 元

《中国社会史文库》

编 委 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先后为序)

冯尔康 刘乃和 李 侃 李学勤

林甘泉 张岂之 赵喜民 彭树智

主编 周天游

编委 (以姓氏笔画先后为序)

刘华祝 刘孟泽 李宝生* 周天游*

高 华 常建华* 葛承雍 廖广洲

(姓名后有*者为常务编委)

目 录

△ 引 言

- 进入历史的深层 [1]
- 1. 自然·文化·人 [1]
- 2. 历史无可回避 [5]

1 迷离的历程

- 中国历史上的人格异常 [13]
- 1. 1 一个离奇的王国 [14]
- 1. 2 走向怪诞的人群 [54]
- 1. 3 投向社会的重影 [74]

2 改道的河流

- 中国历史上的内因性精神失调
..... [85]
- 2. 1 起伏跌宕的情感 [85]
- 2. 2 圈内人 [99]
- 2. 3 梦境人生 [107]

3 躁狂与呆滞的双重奏

- 中国历史上的器质性精神失调 [121]
- 3·1 药物的作用 [122]
- 3·2 酒精的力量 [127]
- 3·3 癫痫的影响 [130]

4 可怜的命运

- 中国历史上神经症的几个个案
..... [134]

5 在生理的剖面上

- 童年·老年·女性 [143]
- 5·1 童年：能力在失调之后 [143]
- 5·2 老年：落日异晖 [147]
- 5·3 女性：恶梦的呼唤 [155]

6 倾斜大船上的人们

- 动荡岁月中的精神失调 [161]
- 6·1 饥饿！饥饿！ [161]
- 6·2 迷狂与攻击 [174]

- 附录1 中国历史上精神异常状况变化表
..... [180]

- 附录2 本书所见精神异常行为 [188]

附录 3 中华医学会精神疾病分类 …… [191]

附录 4 中国古代社会再适应障碍表 …… [197]

△ 后 记

——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 …… [199]

引言

——进入历史的深层

1. 自然·文化·人

人类历史实际上包含了自然、文化和人的相互影响过程。它们的关系不仅是复杂而且也是多变的，任何一种模式或图式的勾勒都不可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全部联系。

历史心理分析在强调人的各种欲力的同时，也对自然、生物、文化因素对人的性格、情绪和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力图从人的活动这一基本出发点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生物因素包括人类在进化之后仍带有的某种动物属性、生理生化因素、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因素、体质遗传因素、神经类型因素以及血液类型因素。从人的心理完整的发展过程看，基因遗传密码、胚胎发育为其演化提供了赖以活动的前提。人的差异——尤其是个体方面的差异——确是在生命之初，便展露端倪了，生物因素决定了人的发展的不同起点。

自然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生态条件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人类在从朦胧的自我意识时期向自觉的自我意识时代过渡中，所

遭遇和观察到的重要认识对象便是它所处的自然景观。自然因素不仅规范了人口的区域性经济特征，而且还向人口传递着一种特殊的自然信息，进而导致其感觉与情绪的区域性特征。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叠合，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不是么，丛林地帯向生活提出的问题不同于山岳、平原和海洋向生活提出的问题，赤道高温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于北极圈和南极圈酷寒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地区可利用的粮食导致了不同的障碍和机会，气候、海拔高度乃至四季都使人产生相应的脾性。

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又导致自然因素对人类的区域性格所产生的恒定影响。从秦汉到明清，天水陇西、巴蜀、关中、燕赵、齐鲁等地区人的性格变化十分微弱。^①

文化因素包括经济状况、道德伦理观念、信仰方式、等级状况、职业状况、性别状况、价值观念、动机冲突、认知能力、思维方式、情绪倾向、智慧水平等因素。文化在比生物和自然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雕琢着人格与行为方式，影响着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

然而，人的活动决不是这几种因素简单相加的结果。人有欲念，尽管这欲念取决于某原因，但欲念的下一个结果却非人们所能确然预定的。人有种种怪癖，有的怪癖甚至无从寻因。对历史，人既是接受者，也是施予者。因此，历史便展示出丰富多样的复杂画面。不妨看一位历史上的“怪人”。近代学者辜鸿铭（1857—1928）精通九种西方语言，被林语堂誉为“当时中国无论才思及英文文字的风格，未出其右者”。然而，深谙西方文化的辜氏，在行为方式上却显得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迂腐、保守和顽固。他矢忠于被时代抛弃的清朝皇室，保留辫子，大肆赞扬缠足，咒骂改良和革命，俏皮地质问反对纳妾者：从来都

是一个茶壶和四只茶杯放在一起，何曾见过四个茶壶与一只茶杯并列？

辜鸿铭的性格何以如此怪癖？原因是多重的。首先，他目睹耳闻了晚清时代中国所饱受侵略和欺凌，深重的民族屈辱感和压抑感使他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和反感心理。他不似当时有些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士人，力主以武力抵御侵略。他痛斥烧杀掳掠“吾土吾民”的八国联军，是一群“卑鄙的基督徒”。他武力御敌的主张曾大为与其有私交的、主张“博爱”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所不解。恨乌及屋，于是，在辜氏偏执的眼中，西方是野性的辐辏，无文化可言，合乎人伦的故土文明倒也敝帚可珍了。其次，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上异化所带来的痛苦，过早、过重、过深地萦绕在辜鸿铭心头，并顺理成章地与上一个因素搅合在一起，强化了他固执的心态。辜氏强调说，文化价值的优越性并不在于物质上的繁荣和生活上的富足，而在于精神方面的内在灵魂。而中国传统文化正具备了这些优秀品质。它的“博大”内容，不仅是挽救中国的良药，也是拯救世界的不二法门。再次，辜鸿铭自动便飘零于国外，虽然接受良好教育，但也遭受了异乡异客所遇的冷眼，他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长期缺乏自我认同和被认同，内心深处的焦虑无处排遣。因而，自卑情绪与长期积郁只能通过加倍的自傲和倔强来补偿。他的个性异常孤傲怪诞，在讨论问题时，易动感情，喜好抬杠并执拗于己见。自相矛盾的话语在其言辞中时时可见。你说西方好吗？我偏认为西方根本不配与东方相提并论。你说清朝腐败吗？我偏要把它作为精神寄托。你说皇帝、太后圣明并要为之祝寿吗？我偏要高喝反调以煞风景：“天子万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普天同庆，苦了百姓。”。他曾怒气冲冲地告诫英国作家毛姆：当你们还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之时，我们就已是高度进化的人类了。显然，辜鸿铭的怪癖固执，是在社会大文化背景和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

历史是人的活动，所有的历史规律都是通过人的创造在具体的、充满生机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展露的。人不是历史舞台上的傀儡，而是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演员。同样，个人性格特质和行为方式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也绝不是用群体力量就可以简单取代了的。纵使把历史活动抽象升华到最高的层面，也无法省略和勾销个人的活动和力量。应当承认，远非所有的历史趋势都是杰出人物所能控制的，当事态幼芽怒放或大厦将倾之时，要求一个人扼制其势头，无疑过于苛刻。这里可以举出中国明王朝不可遏止的崩毁与崇祯皇帝尽心尽力的无效挽救作为例证。但是，也的确有伟大、杰出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的转折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们的气质性格、意志品质和洞察力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的，其作用也因此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的。人们无法设想有多少位王翦、蒙恬或李斯能替代秦始皇，或者有多少位董仲舒、公孙弘、卫青、桑弘羊等同于汉武帝。离开了李白，唐代诗界便失去了一座耸立的高峰。然而，假定（历史上曾有多少这种并非不可能的假定）英华初现时的李白突然亡故，能有人去弥补这个艺术空缺吗？人们又焉知是否有比李白更有才华者因此而未能出现？没有理由低估个人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正如没有理由低估群体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一样。二者不分主次，同等重要，只是由于观察角度不同，才产生了分析时的侧重。

2. 历史无可回避

精神异常是一个模糊而又明确的概念。说它模糊，是因为医学界、心理学界，至今在界定哪些是异常行为哪些是正常行为时仍见仁见智；说它明确，是由于人们似乎又都知道它的所指内容。因为本书不是医学论著，可以合情合理地避开啃咬还在讨论中的异常行为类属的硬果，集中叙说那些已被认定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精神异常内容，而且更看重它对传统中国社会、传统中国人生的影响。

历史无可回避。在中国人所走过的几千年的文明步途中，精神异常的痕迹清晰可辨。

似乎罗列一个“吉尼斯大全”式的材料更为醒目一些：

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精神异常行为是：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精神异常行为是：战乱和饥饿导致的偶发性食人行为、同性恋行为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幻觉和躁狂、抑郁情绪。

中国历史上最易于出现精神异常行为的阶层是：皇帝、贵族、文人、伶人、宦官。

中国历史上最不易于出现精神异常行为的阶层是：农民。

中国历史上最易于导致精神异常行为的社会因素是：动荡、战乱。

中国历史上最易于导致精神异常的物品是：致幻药物、酒精。

中国历史上涉及人口最多的精神异常行为是：由饥饿、动荡和战乱所导致的偶发性食人行为和社会迷狂。

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精神异常行为是：食人癖、偶发性食人行为、躁狂冲动中的虐杀行为、病理性激情。

中国历史上最滑稽的精神异常行为是：劳作癖和好客癖。

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恶心的精神异常行为是：恋尸癖。

中国历史上最为痛苦的精神异常行为是：性压抑。

中国历史上最可怜的精神异常行为是：神经症。

中国历史上最无法预计后果的精神异常行为是：躁郁症、精神分裂症和病理性激性。

中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精神异常行为是：洁癖、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智商最低的精神异常行为是：老年性痴呆、儿童精神发育不全、恋尸癖。

中国历史上男性中最常见的精神异常行为依次是：躁狂中的虐杀行为、同性恋、色情狂、恋小足癖、酒精中毒导致的各种迷狂行为和食人癖。

中国历史上女性中最常见的精神异常行为依次是：同性恋、癔症和躁郁症中的冲动行为。

中国历史上最具本土特色的变态行为是：男性中的恋女子小足癖和科场综合症、由性压抑导致的变态行为。

.....

这样的罗列还可以继续下去，读者如果有兴趣就请您读读正文吧。但是，请不要对精神异常行为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精神异常者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之躯，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和

人生，他们的行为是古怪、荒诞和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精神处在与正常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中；无论在正常人看来，这是多么的不合情理，也无法使异常者彻底改变自己的想法。同样，无论异常者的精神状态如何被扭曲，也无法使其产生的作用稍有所减。没有了异常精神，也就不会有正常精神，也就不会有完整的世界。人的历史，毕竟是由正常人和异常者、正常心理和异常心理（二者有时在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共同造成的。

确乎，精神异常行为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传统中国人生和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历程的重要方面。

比如，为什么在帝王贵族和文人等阶层中大量存在各种变态行为，而在农民中却较少见到，是因为外力约束较弱和放纵的生活方式使得帝王们和文人们容易走向异常，还是因为完全相反的原因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民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精神异常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主义在多大的范围摧残扭曲着正常的人性，使人们如何由正常转为异常？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②

还比如，最具中国特点的变态行为——恋小足癖、科场综合症证明了文化扭曲是如何重合的，重合之后又必然以新的能量作用于社会。恋小足癖和科场综合症从其渐生的朦胧、到趋之若鹜的嗜好、再到甘之若饴的变态沉浸有一个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自身原有的精神面貌。有人考证《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失心”之事有其原型，先姑且不论是否可靠。真实的例子是屡见不于史册的。比吴敬梓晚了近一世纪的清末人震钧所撰的《天咫偶闻》卷九记述了一位赴京赶考的文人失心躁狂终未还乡的辛酸故事：徐退，扬州人，应京兆试不第，遂

不归。日从田夫野老，高歌狂呼西山林麓之间。衣纸衣，带假髯，醉后便狂涂乱抹，如此近二十年。^⑧如果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淡化或消除这种行为比它的形成还来得漫长和困难得多。入主中原的清室，诧异也鄙视缠小足行为，曾下令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不准缠足。但希望这种禁令能收效只是一种神话，即使你是性格急躁的顺治帝福临，即使你是雄才大略的康熙帝玄烨。很快，清室便面对现实，在康熙六年弛禁，禁令只实行了22年。官吏、富商和文人们又可以在秦淮河上有滋有味地欣赏歌女们的“莲瓣纤纤，花鬟袅袅”、“六寸圆肤，春花致致”了^⑨。这其中的意义自然远非单纯的精神分析所能穷尽的。

又比如，精神异常行为的区域分布所说明的区域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明、清时期同性恋者集中的重镇是福建、两广、江浙和北京。其中，北京五方杂聚，情况特殊；而福建等地的男性中风靡的同性相恋的变态风气远非它处所能比拟，广东顺德等地的女性还建立了同性恋者的组织。这是否能了解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的差异提供一条线索乃至提示一点历史的启迪呢？

再比如，原始宗教和鬼神观念在中国人的文明步途和社会生活中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也能在变态行为的表现中得到别具一格的说明。这种影响在个体身上是十分明显的，元代人黄与行在一次黄篆大醮的引发下精神躁狂，“口中言语谬乱”，在三年后死去。^⑩某种特定的场景给中国人的刺激引人注目。宋元时杭州北关门外厕舍有“厕鬼”为祟的传说，它使不少人胆战心惊，竟有人溺死于厕池。一位被救起者清醒后诉说其幻觉：“有人持筒相招赴宴，但见亭馆高洁，鼓乐喧阗，即不知为厕舍也。”^⑪它对群体同样是巨大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集体性躁狂、

恐惧、幻觉都与民间鬼神观念的极端发展有直接关系。从宋至清代风靡江南地区的对“五通”神的崇拜迷狂，是最为突出的例子。明代学者陆粲在《庚巳编》中记录了可以归之为精神分裂症、恐惧症或人格异常之类的精神变态行迹的许多个案。^⑨他几分感慨几分愤然几分畏惧地写道：这些鬼物是深山老魅、山萧木客所变幻，百姓祭之如观音、城隍、土地，甚至借贷设坛。偶尔获佑则归之于神，逢祸事则自咎不诚，至死也不敢出一言怨讪。一些自称为“五圣阴教”的巫婆以“收惊”“见鬼”妖法迷惑人民，于是，“山中人言，往往见火炬出没湖中，或见五大丈拥胎从姬妾入古坟屋下，张乐设宴，就地掷例，竟夕乃散去，以为常”。在人人深信人口相传的社会氛围中，“五通”鬼魅的“妖力”雄张，“多乘人衰厄时作祟，所至移床坏户，阴窃财物”。妇女受暗示的影响更大，她们“涉邪者及年当天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见贵人巍冠华服，仪卫甚多，宫室高如为王者居，妇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数十辈，皆盛妆美色，其间鼓吹喧阗，服用极奢侈”。陆粲本人对这种状况无能为力，他希望行政长官能举善政，严禁淫祠，使妖魅消沮。“五通”神“为祟”及类似的故事无疑值得研究者更为深入的分析。

再比如，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异常行为究竟对历史活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如弗洛伊德所说，历史上充斥着神经官能症患者，偏执狂和精神病患者的名字。他们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但他们也同样迅速地垮台。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们对所处的和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特点，使其发展不平衡，欲望也不正常地强烈，从而，他们能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唯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

抗。^⑧或者如有存在主义倾向的美国心理学家贝克尔 (Ernest Becker) 所说, 神经症是一种逃避不幸的复杂技术, 放弃这一机制就会为绝望所淹没。因而, 精神异常乃是有其“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的底蕴”。^⑨如果弗氏和贝氏说得并不完整和具体, 人们能否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出其作用程度的上限和下限、作用方向的所指以及具体的精神异常行为的特定影响呢? 秦始皇对死亡的异常恐惧, 汉哀帝和董贤的同性恋行为, 前秦王苻生、南朝刘宋和北朝北齐某些君主的躁狂虐杀行径, 隋炀帝、金海陵王、元顺帝和明武宗等帝王的色情狂倾向, 明太祖的偏执型人格异常, 晋惠帝的智力低下, 清光绪皇帝的严重的神经衰弱,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服食毒药“五石散”之后的躁狂表现, 西汉前期官至丞相的石奋的强迫症, 西汉前期政治家贾谊的抑郁倾向, 隋唐时代军官、节度使们如高瓌、诸葛昂、张茂昭、朱粲等人的食人癖, 阮籍的慢性酒精中毒, 隋文帝杨坚的老年性躁狂, 北宋学者沈括在夫妻生活上的受虐行为, 明朝太宰王国光的老年性机能亢进, 清乾隆朝大将海兰察的色情狂表现,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少年时代的失恋以及由此产生的“恋狐”、科场屡试不中以及由此产生的“科举”情结, 历代宦官如东汉的“十常侍”、明代的王振、陈增和魏忠贤等人的虐杀及其他反社会行为, 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奇特梦境和幻觉, 湘军统帅曾国藩对鸡毛的畏惧, 晚清洋务派中坚人物之一张之洞的观酒癖好……, 这一系列事实必然为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甚至, 中国历史上某种奇异的情形也能对现代精神医学、心理学有所帮助呢。这里, 只举几个例子: 一则, 明朝弘治末年 (约 1487), 隋州应山县女子生髭, 长三寸余。^⑩ 一则, 明隆庆二年 (1568), 发生在山西的男子“忽转女形”事件。^⑪ 一则, 清代